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作者、讀者、意義

一論 Quentin Skinner 之脈絡主義中的若干問題(I)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6-2414-H-034-007

執行期間：2007 年 08 月 01 日至 2008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梁裕康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郭惠雯、蔡曉菁、翁敏祚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

中 華 民 國 98 年 07 月 24 日

摘要

英國的劍橋學派在當今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是一支頗具影響力的學派，而當中 **Quentin Skinner** 正是此學派中的主要理論家之一。**Skinner** 對劍橋學派的主要影響，應當是來自於他所提出的特殊研究方法。在其早期的理論中，**Skinner** 利用日常語言哲學中的語言—行動(speech-act)理論，指出在研究思想史的過程當中，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文本所展現的字面意義，還要進一步探求思想家寫作時究竟要透過該文本從事何種行為。而較近期的 **Skinner** 則是轉向了所謂的概念史(history of ideas)。在他的概念史研究中，**Skinner** 將重心放在思想家如何透過修辭(rhetoric)的方式來扭轉當時社會對某些概念的評價。在這裡 **Skinner** 提出一個重要的前提：一是一種反道德實證主義(moral anti-realism)，強調美德(virtue)與罪惡(vice)其實不是相互對立的二種價值，而是一體的二面，因此一個行動可以被同時視為善或惡的。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才得以理解理論家何以能以修辭這種方法來嘗試改變社會對某一價值的認知態度，而非改變社會所認知的對象或事實。

那麼在乍看之下不甚相關的二個階段中間，究竟存在某種理論上的一致性，亦或是二個研究途徑各自包含著不一樣的研究旨趣？本文將嘗試去釐清這個問題。筆者將借用心靈與語言哲學家 **John Searle** 的理論，說明 **Skinner** 筆下的思想家們透過修辭去改變一個概念的社會認知，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改變影響意向性內容的周邊條件。尤有甚者，其最後的結果則是建立起一套新的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內涵。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表示一方面解釋意向性的改變就等於解釋了何以思想家為何能藉由修辭改變某種社會行為或價值，另一方面也將說明意向性本身就足以發動行為。這二點將可視為對 **Skinner** 前後期理論間的某種補充。

關鍵字：Quentin Skinner, John Searle, 修辭、語言—行動理論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exists any philosophical consistency between Quentin Skinner's theory of Rhetoric.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Skinner's emphasis on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 utramque partem* in moral concepts and the skill of *paradiastolic* in rhetoric can be finely supported by John Searl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lso the application of Searle's theory can help to understand what conceptual change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mean in Skinner's theory and how they work.

Keywords: Quentin Skinner, John Searle, rhetoric, speech-act theory.

英國的劍橋學派在當今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是一支頗具影響力的學派，而當中 Quentin Skinner 正是此學派中的主要理論家之一。Skinner 對劍橋學派的主要影響，應當是來自於他所提出的特殊研究方法。在其早期的理論中，Skinner 利用日常語言哲學中的語言—行動(speech-act)理論，指出基於日常語言所能展現的複雜功能，一個發語(utterance)—乃至於文本(text)或論述(discourse)—會呈現出雙重的意義。因而他進一步指出，在研究思想史的過程當中，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文本所展現的字面意義，還要進一步探求思想家寫作時究竟要透過該文本從事何種行為 (see 梁裕康，民 95；陳思賢，1999)。而較近期的 Skinner 則是轉向了所謂的概念史(history of ideas)。在他的概念史研究中，Skinner 將重心放在思想家如何透過修辭(rhetoric)的方式來扭轉當時社會對某些概念的評價。

那麼在乍看之下不甚相關的二個階段中間，是否存在某種理論上的一致性，亦或是二個研究途徑各自包含著不一樣的研究旨趣？本文將嘗試去釐清這個問題。也就是說，Skinner 後期轉向修辭研究的目的，在於他認為在理解文本的雙重意義上，對於語言中所蘊含的行動(the doing in saying)是能夠透過修辭的方式來理解的。爲了要說明這個假設，以下將借用心靈與語言哲學家 John Searle 的理論，解釋 Skinner 筆下的思想家們透過修辭去改變一個概念的社會認知的行為，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改變影響意向性內容的周邊條件。尤有甚者，其最後的結果則是建立起一套新的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的內涵。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表示一方面解釋意向性的改變就等於解釋了何以思想家爲何能藉由修辭改變某種社會行為或價值，另一方面也將說明意向性本身就足以發動行為。這二點將可視爲對 Skinner 前後期理論間的某種補充。

Ars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

對 Skinner 而言，在語言所能展現的眾多功能或者是行動中，他所關注的是政治世界(political world)與語言的連動關係，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政治上的創新(political innovation)與語言中所蘊含的意義間的連動關係(Skinner, 1989: 6)。這個說法的乍看之下十分含糊，需要更進一步地解釋。所謂政治上的創新其實指的是一種對政治世界理解的變遷。若把這個概念當作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來看的話，其所指的是社會對政治現狀的理解如何被改變或維繫。坦白說這樣的見解無甚特殊之處，然而 Skinner 的命題真正獨到之處在於他將這種變遷的過程與語言連結在一起，認爲政治世界的變遷與語言的變遷呈現出一種共變關係。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樣的命題要能成立，Skinner 必須先證明一個前提，那就是語言與世界的構成條件(constitutive)之一。在一般的概念中，語言往往只是內在心靈(mind)的外顯表徵，而不是心靈活動本身，因此我們常會聽見類似「語言只是一種（表達內心想法）的工具」之類的說法。換句話說，語言常被認爲只是用來描述我們心靈活動的工具，而不是構成或界定心靈活動的條件。然而自從這樣的看法被後期的 Wittgenstein 所質疑後(Wittgenstein, 2001: para. 1-7)，語言才逐漸被視爲是構成心靈活動的重要因素。Skinner 也延續了這個見解，但是他從另一種迂迴的方式來討論他對語言與世界間關係的看法。他首先區分語言與概念(concept)。並進一步提問：一個字(word)或詞(term)是如何取得(acquire)其意義的？一種回答—例如 Skinner 所批評的 Raymond Williams 的說法—認爲這個字或詞所代表的概念就是其意義。然而他卻反對這樣的說法，而認爲字詞的意義並不見得與概念相關(Skinner, 1989: 7-8; 2002(1): 159-60)。他很正確的指出，我們可以很一致的理解一個概

念卻沒有任何一個字詞與之對應，也可以很一致的使用一個字詞而沒有概念與之對應。換句話說，字詞與概念間的關係既非意義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Skinner, 1989: 7-8; 2002(1): 159-60)。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概念」，在 Skinner 的用法中，其實指的是心靈所認知的內容。

如果，按照前面的分析，語言必須以構成心靈活動的方式跟世界發生關係，但是，按照 Skinner 的說法，概念作為心靈活動的內容，又無法決定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因其既非構成意義所需的充分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那麼至少在政治世界中，語言與世界並沒有必然的連結關係。然而這樣的結論豈不等於是說 Skinner 將思想史等同於概念史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嗎？對於這個問題，Skinner 提出了一種經驗上可以（但是邏輯尚未必行得通的）驗證：

一個群體或社會自我意識到已經擁有一個新的概念的最確切的標記就是（跟此概念）相對應的語詞已被發展出來，而且這個語詞可以被用單獨取出來以一致地標準來討論那個具爭議性的概念……擁有一個概念至少指的是可以標準地(standardly)理解與其相對應的語詞的意義(Skinner, 2002(1): 160)。

Skinner 在這裡很清楚的說明了：即使在邏輯上概念與語句未必存在必然的對應關係，但是在歷史上我們的確可以看見，至少在某些（甚至是大多數的）時空底下，二者間是存在某種緊密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概念史所要研究的對象是必須有所篩選的：必須是語詞與概念間的相對關係已經存在的概念才有被分析的重要性（use theory of meaning 或一種 pragmatic 的而非 a priori 的意義概念）。至於其他有語詞卻沒對應概念，或者僅有概念或沒有語詞情況，都不在 Skinner 的分析範圍裡。這個說法某種程度提供了一個標準，得以解釋為什麼概念史研究的侷限在所謂的「關鍵概念」(key concepts)，而所謂關鍵概念的標準又是什麼。

一旦確立了語言與政治世界的確切關係的確存在之後，Skinner 接下來要處理的是一個有關 what 的問題：「當我們發現我們在爭吵應不應該應用一種描述到一個特定的行動或事態時，我們到底在爭吵有關這個字（描述）的什麼東西(Skinner, 1989: 8; 2002(1): 160)？」但是 Skinner 真正感到興趣的不只是這個語言學範疇的問題，還包括了另一個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問題：在一個字詞從舊的位置到找到新平衡點的過程中，究竟是誰發動了這樣的變化？又是透過了誰來發動這樣的變化？這個找到新平衡點的過程又是由誰來決定其結果？這些問題就構成了 Skinner 轉向修辭學研究的出發點。然而此處暫且不談他如何分析這些問題，至少在這個推論過程中，可以發現字詞從字詞群(lexicon)中的一個變動的形式。位置變動到另一個位置的過程中—至少在變動到 Skinner 所強調的建立起「標準」用法的過程中，絕對不是一個個別私人心靈的活動過程，而是必須獲得所有語言使用者的同意才可能完成。正因為如此，Skinner 可以很篤定地地宣稱，（標準）語意的變遷會帶動政治世界的改變。

此外，根據上述的說法，Skinner 更進一步的探討意義。既然一個字詞的意義由三個層面來決定，邏輯上任何一個層面的變動都會造成意義的變動。換句話說，所意義的變動其實存在多種的型態。最基本的，也是一般人概念中最熟悉的，就是語意上的變化。但是 Skinner 強調，除了這種大家熟悉的情況外，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情形：在語意不變的情況下，意義也可能改變。這裡有二種情況，一是語意不變但是指涉環境改變，另一個狀況則是語意

不變但是使用者的態度改變。這些情況都會造成字詞所承載的意義的變遷。在這當中，Skinner 特別注意的是態度變遷的問題。他特別指出態度變遷還有很多類型：其一是不同意對盛行的標準意義所持的態度，另一種則是抱持對盛行的標準意義所含的態度的相反態度。前者又可細分為對標準態度的消極擱置，與對標準態度的評價性(evaluative)轉換成描述性(descriptive)地位卻一直沒有受到學界重視，而這些重要而被疏忽的模式正是透過所謂的修辭方法所推動造成的(Skinner, 1989: 18-9; 2002(1): 169-71)。Skinner 對這些意義變遷模式所做出的基本分類，在本文稍後即將指出，奠定了他後來修辭學轉向的基礎，因為他之後的理論，正式要論證在這眾多的意義變遷模式中，有若干形式在思想史概念變遷中佔有重要。

Rhetoric: Modifying the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Searle 的哲學分析能否帶給 Skinner 的歷史分析任何啓示或解釋？對筆者而言 Searle 至少提供了幾個理解 Skinner 理論的途徑：首先，Searle 對於社會實體跟制度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 Skinner 所謂的概念為什麼能構成政治世界；其次，Searle 對社會實體中所包含的集體意向性與構成性規則的說明，在某種程度上，也在知識論上支持 Skinner 認為修辭具有造成概念變遷、並進一步改變政治世界的可能性說法；最後，Searle 的理論解決了 Skinner 理論中的一個問題：也就是 context 與作者 intention 之間是 seamless 的關係，而不是二個獨立的範疇。

從 Searle 的推論出發，我們很快就能明瞭何以 Skinner 認為概念變遷是促成政治世界變遷的理由。從 Searle 的角度來看，Skinner 所謂的概念其實具備了社會實體的各式表徵：首先，「概念」，如 Skinner 所舉的例子 Milton 所謂的「原創性」，指定了某種功能：亦即好的詩必然要具備這種特性，否則就不能算是好詩了；其次，當這種概念得到社會承認時，也顯現出一種集體意向性，否則這種標準將會落入唯我論而使得概念失去流通以及認知的意義；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個「概念」形成一種構成性規則，從此之後評價詩的好壞就有了新的標準。接下來，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概念」就會進一步地去創造出許多的社會事實，讓這個社會實體進一步得以實現。對 Skinner 而言，這個階段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原創性」這個用語的正式出現。這個用語的出現以及流通所象徵的，是這個「概念」的正當性或有效性獲得社會全體的正式承認，成為這個社會創造社會事實時所會援引的正式規則。隨著時間的演變，這個概念還可能出現二種變化：一個就是會形成某種制度，例如爾後各種文學競賽將以「原創性」做為評價標準；另一個則是這個概念會逐漸的退到背景之中，亦即雖然大家不會在頻頻援引這個概念作為規則，但是每個人在寫作詩句時所需的 know-how 仍舊受到其影響，例如大家都會知道寫作時盡量不要用別人用過的文句等。此外，概念本身，如同所有的社會實體與制度，都具備了 self-referentiality 的特徵：概念之所以能創造出各種社會事實的原因在於社會事實是一種概念的規範性來自於其被使用者的普遍承認與接受。也就是說，概念的有效性其實是 mind-dependent 的。

綜合以上所述，Skinner 所謂的概念是構築政治世界的基礎，用 Searle 的話來翻譯的話，意味著概念本身已經形成了構築社會事實所需要的基礎，因為，每一種概念本身的定義或用法構成了這個概念所要達成的功能的滿足條件。Skinner 對許多概念進行的歷史分析所要追溯或挖掘的，其實就是特定概念在不同的 context 中所具備的不同的滿足條件——特別是那些

已經後撤到背景/網絡中的制度。在這裡，各種意識型態相當於設定了各式各樣的滿足條件制度或者背景/網絡。另一方面，此處也顯現出 *self-referentiality* 的特點：一種概念，例如前面舉例的自由，能影響政治世界，也就是能影響到使用這個概念的人。但是另一方面這個概念能有規範力，是因為我們願意接受這種概念。那麼究竟是概念規範了我們或構成了政治世界，亦或是我們的意向性賦予概念這樣的規範性？但是無論是何種情況，這個特徵說明了概念與政治世界間確實存在一種無法截然劃分的關係。

概念變遷與政治世界的關係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修辭與概念變遷之間的關係。從 Searle 的理論來看，一個概念的意義大致上取決於幾個部分：一是意向性狀態所反映的心靈狀態為何；二是這個意向性狀態的滿足條件為何。而對於一個具社會性的概念來說，後者經常以構成性規則的形式出現，並且這個概念經過長時間的使用後，還可能會化身為背景/網絡。換句話說，想改變某種概念的意義的話，不是直接改變其中的意向性狀態（以及其所反應的心靈狀態），就是去改變其滿足條件。

這樣的說法，恰好跟 Skinner 對將一個字詞的意義分為語意、指涉與使用者態度的分類有若干相通之處。意向性狀態所反映的內容的一部份就是使用者的態度，而指涉所說的就是滿足條件。因此，簡單的說，修辭所要改變的對象就是意向性狀態或者是其滿足條件。如果發話者不同意的是概念所反應的意向性狀態，亦即發話者認為這個概念應該反應的是她指出的態度（就某個角度來說也就是意向性狀態），而非這個概念原本所設想要反應的態度，那麼發話者所要做的是要改變社會對這個概念所反映的態度的集體認知。相同地，如果她所不贊成的使用這個概念的滿足條件，那麼她所試圖要改變的就是社會對這個概念的滿足條件所認知的內容。

Skinner 在某種程度上也接受這樣的說法，事實上這正是他被稱為 *contextualist* 的原因。就好像作為一套構成性規則，網球規則創造了網球這樣的活動（一種 *self-referential* 的產物）。但是我們並沒有任何理性的論據——一種位於這個 *self-referentiality* 的 *circularity* 之外的論據，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人類社會需要網球這種活動，或者網球比棒球來的更值得學習。更重要的是，我們更不可能把網球規則沿用到其他非網球的活動中作為準則：網球規則若且唯若在網球比賽中有效。或者換句話說，修辭的作用不是在 *self-referentiality* 裡面提供完備的推論，而是提供在這個 *circularity* 之外，告訴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的 *self-referentiality* 的論據。而這個論據，借用 Mark Bevir 的話，不存在任何「發現的邏輯」(*logic of discovery*)。

Conclusion: From Speech Acts to Rhetoric

筆者曾經指出，在他的後期理論中「修辭轉變為 Skinner 具體驗證作者意圖的對象」（梁裕康，民 95：117），而本文即是對這個命題更進一步的分析。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發現，一方面 Skinner 特有的方法，包括將人類表意方式都以語言—行動理論來解釋、以及重視文本的脈絡與作者意圖對文本意義的影響（找出處），貫穿了他前後期的理論。從語言—行動理論出發，Skinner 將發話者的意圖視為決定意義的關鍵，並將文本視為作者遂行其意圖的一種 *illocutionary act*。而要正確地理解作者之所以要透過文本交代什麼（即 Skinner 所謂「*what is the point?*」的問題），必須要將作者的意圖加以考慮，否則只限於文字上的字面解釋將會忽略掉這一層更重要的意義。而在後期 Skinner 轉向修辭與概念變遷的研究，是基於底下的一種假設：概念不僅是概念，更是一種語言—行動的表現，因此概念其實就是構

成實際政治世界的要素。既然如此，概念的變遷就是改變實際政治世界內涵的過程。而一個社會之所以會抱持特定的概念，是出於一種 holistic 的觀點：受到當時意識型態的影響。Skinner 進一步主張，促成概念變遷的方法之一——或許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修辭。透過修辭，作者們試圖去改變或鞏固（不論成功與否）當時社會對於特定概念的理解。

對於這樣的見解，本文嘗試以 Searle 的理論提供另一種角度的詮釋。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一來能觀察到 Skinner 賦予修辭做為推動概念變遷的說法根據為何，二來可以發現在 Skinner 早期理論中具有關鍵地位的作者意圖如何繼續在修辭的方法中發揮功能，三來可以進一步的理解修辭推動概念變遷的具體機制，在於修辭要改變的是決定概念意義內涵的滿足條件，以及讓社會大眾去接受這套新的滿足條件。透過 Searle 的理論，Skinner 筆下的修辭將不僅是文學研究中的一種技巧，還扮演了改變社會大眾認知內涵以及創造社會事實的角色。

參考書目

- Apel, Karl Otto. 1991. 'Is Intentionality More Basic Than Linguistic Meaning?' , in Ernest Lepore and Robert Van Gulick eds., 1991, pp: 31-56.
- Aristotle. 1925. *The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icero. 1949. *De Inventione*. H. M. Hubbell trans. London: W. Heinemann.
- Clark, Elizabeth A. 2004.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otion, Nick. 2000. *John Searl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wendorf, Günther and Georg Meggle eds. 2002. *Speech Acts, Mind, and Social Reality*.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abermas, Jürgen. 1991. 'Comments on John Searle: "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 in Ernest Lepore and Robert Van Gulick eds., 1991, pp: 17-30.
- Kant, Immanuel. 1991. *The Moral Law: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London: Routledge.
- Lepore, Ernest and Robert Van Gulick eds. 1991. *John Searle and His Cr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Quintilian. 1920-2. *Institutio Oratoria*, 4 vols. H. E. Butler ed. and trans. London: W. Heinemann.
- Searle, John 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arle, John R. 2002. 'Speech Acts, Mind, and Social Reality' , in Günther Grewendorf and Georg Meggle eds. 2002, pp: 3-16.
- Skinner, Quentin. 1966.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 *Philosophy* 41, pp. 199-215.
- Skinner, Quentin. 1969.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 *History and Theory* 8, pp. 3-53.

- Skinner, Quentin. 1970. 'Conventio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 pp. 118-138.
- Skinner, Quentin. 1971. 'On Performing and Explaining Linguistic Actio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1, pp. 1-21.
- Skinner, Quentin. 1972a.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ries IV, 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 and Quentin Skinner eds., pp. 136-157.
- Skinner, Quentin. 1972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3, pp. 393-408.
- Skinner, Quentin. 1974. '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Political Theory* 2, pp. 277-303.
- Skinner, Quentin. 1978.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另有奚瑞森與亞方（2004）之中文譯本《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二卷。台北：左岸文化。
- Skinner, Quentin.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 L. Hanson eds., pp. 6-23.
- Skinner, Quentin. 1996.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uentin. 1998.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Quentin. 2001. 'A Third Concept of Libert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No. 117, pp. 237-268. Reprinted in Robert E. Gooding and Philip Pettit eds. 2006.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Anthology*, 2nd edition, pp. 398-415. Oxford: Blackwell.
- Skinner, Quentin.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and expanded ed. London: Fontana.
- Wittgenstein, Ludwig. 2001.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trans., 3rd edn. Oxford: Blackwell.
- 史金納，昆丁（Quentin Skinner），2004，〈《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二卷，奚瑞森與亞方譯〉。台北：左岸文化。
- 陳思賢，1999，〈語言與政治：關於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的一些問題〉，收錄於陳思賢著，〈《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台北：五南。
- 梁裕康，民 95，〈語言、歷史、哲學——論 Quentin Skinner 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28：91-122。
- 蕭高彥，2004，〈史金納《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導論〉，收錄於史金納（2004），頁 5-9。

計畫成果自評

「劍橋學派」在史學方法上最突出之處，應該在於此學派大量應用了二十世紀以來所發展的、例如語言哲學、文學批評等各式新穎的思想工具。本研究的目的，則是希望在此方法日益成熟而漸受重視之際，能夠回過頭來重新檢視其有效性。此方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將「語言」此一成分視為從事思想史研究中長期被漠視、然而從方法的角度而言卻不應被忽略的角色，提高到詮釋 text 的關鍵地位上。可是也正因如此，此方法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本研究則是希望在這個哲學與方法的爭議中，提供若干可供參考的分析結果。